

○ 于秀情 / 著

明朝经营百夷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明朝经营百夷研究

MINGCHAO JINGYING BAIYI YANJIU

◎ 于秀情 /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朝经营百夷研究/于秀情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0. 2

ISBN 978-7-81108-804-5

I. 明… II. 于… III. 古代民族—民族政策—研究—中国—明代 IV. D691.72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3355 号

明朝经营百夷研究

作 者 于秀情
责任编辑 吴 云
封面设计 金 星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9.25
字 数 232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804-5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傣族是我国云南省与中南半岛各国关系密切的民族。她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不同历史时期称呼有别。据史料记载，傣族在西汉时期被称为“滇越”，在东汉时期被称为“掸”，在三国魏晋时期被称为“鸠僚”。唐朝时，傣族因居住地的环境等特点分别被称为“茫蛮”、“茫天连”、“茫吐蕃”、“大賧”、“茫昌”、“茫盛恐”、“茫𪛗”、“茫施”等；因其独特的民族服饰特征，他们分别被称为“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僧耆”等^①。宋时，因为文献的缺乏，仅知傣族被称为“白衣”。元代，傣族被汉族称作“金齿百夷”，简称为“百夷”。在《元史》中，滇西傣族多被称为“金齿”，西双版纳傣族多以“徯里”、“车厘”称谓出现。明代，滇西傣族被称为“百夷”，西双版纳傣族以“车里”名被汉文文献所记载。到了清代，傣族被称为“摆夷”。

本书按照傣族在明代的称呼，用“百夷”记述。明洪武十五年，百夷归附。明太祖初步设置了诸多百夷土司区，制定了百夷土司制度；明成祖制定了百夷土司的印信、底簿、勘合等制度，加强了对百夷的统治。此后，明朝统治百夷地区的土司制度得到不断完善。

虽然晚明时期，缅甸土司获得独立发展，并且扩张势力，侵犯百夷土司。明朝廷无力顾及百夷土司，甚至妄杀百夷土司以换

^① [唐]樊绰：《云南志》，向达校注《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年，第103—104页。

取边疆安宁，但是百夷土司仍然坚持抵抗缅甸莽氏的侵犯，对明朝表示忠顺。

傣族在明代被视为“远人”、“远夷”、“属夷”，被视为“徼外”之夷。当明朝处于强盛发展时期，明朝政府对百夷土司的招抚、安抚政策与手段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加强了明朝对百夷地区的统治，百夷土司的统治得到了进一步稳固，也更加依附于明朝；而当明朝处于衰败之际，对百夷地区的统治显得懦弱无能之时，百夷土司的依附之心经受住了极大考验。

傣族地区肥沃的土壤、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了傣族儿女的热情、忠诚和勇敢的精神，傣族始终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载于中国史册。

目 录

绪论·····	(1)
一、选题意义·····	(1)
二、历史资料和研究现状评述·····	(2)
三、主要论点与研究方法·····	(11)
第一章 13—14 世纪百夷地区的形势 ·····	(14)
一、百夷归附元朝·····	(14)
二、元朝统治百夷的政策——土司制度·····	(21)
三、平缅思可法称王建制统治百夷·····	(31)
四、元朝末期征讨思可法·····	(33)
第二章 明朝百夷土司区的设立·····	(36)
第三章 明朝经营百夷地区的主要政策——土司制度·····	(57)
一、土官名号、级别和隶属关系·····	(60)
二、信符、勘合、底簿、金字红牌制度的确立·····	(62)
三、朝贡制度的完善·····	(66)
四、赋税制·····	(79)
五、土官承袭制度·····	(84)
六、土官的俸禄、升迁和惩处·····	(91)
七、征调土兵·····	(95)
八、流、土共治·····	(96)

第四章 明朝兵威平定百夷土司反抗的政策·····	(104)
一、百夷土司与明朝统治的矛盾·····	(105)
二、“三征麓川”之前明朝政府对麓川的用兵·····	(118)
三、王骥“三征麓川”·····	(128)
四、对明朝兵威镇压政策的评价·····	(140)
第五章 明朝经营百夷的其他举措·····	(149)
一、招抚政策·····	(149)
二、分化较大土司的势力·····	(159)
三、加强云南与百夷交界地区防线的建设·····	(164)
四、“以夷攻夷”政策·····	(173)
五、严禁云南边民与百夷往来·····	(178)
第六章 土司制度的破坏和缅甸的势力扩张·····	(183)
一、晚明百夷土司制度的破坏·····	(183)
二、缅甸的势力扩张·····	(209)
第七章 晚明经营百夷的政策·····	(236)
一、痛击缅甸对百夷的侵犯·····	(236)
二、加强边防建设·····	(251)
三、结语·····	(262)
参考文献·····	(271)
一、历史文献·····	(271)
二、学术界现已出版的专著·····	(274)
三、学术界现已发表的学术论文·····	(278)
四、博士论文·····	(285)

绪 论

一、选题意义

元明时期，傣族被称为“百夷”。“百夷”主要分布在今云南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临沧地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南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南部，以及缅甸克钦邦北部、北掸邦和泰国北部清迈、清莱地区与越南的莱州。本书研究的范围包括上述地区。

元朝在包括百夷地区在内的南方民族地区主要施行两种制度：一是郡县制；二是土司制。土司制度是对元代以前历代中央王朝经营南方民族地区的“羁縻政策”的继承与发展。元朝在百夷地区一方面施行郡县制，以百夷聚居地区为单位在百夷地区设置路、府、甸；另一方面在所设置的百夷地区各路、府、甸内部施行土司制度，任命土酋为土官，依照其原有的社会组织方式统治其民，使各土司区自行发展。但是元朝规定百夷地区各土司必须定期、定额向元朝纳贡，元朝派官吏向土官索取贡纳物资。明朝时这一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与发展。由于百夷地处西南边疆地区，明朝经营百夷地区的土司制度就与其他民族地区施行的土司制度有较大区别，这与明朝西南边疆的发展形势也有一定关系。

学术界关于傣族历史的研究成果不少，有的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但是关于明朝经营百夷地区的历史研究却较为罕见。拙作

试就明朝经营百夷地区的政策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以丰富傣族历史研究的内容，从而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傣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傣族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关系、傣族与汉族的关系以及傣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等，为我们今天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提供借鉴，充分发挥民族文化生命的原动力，为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尽一份力。

二、历史资料和研究现状评述

记载傣族历史的汉文文献资料虽然是最早的，但是却很少。如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东观汉记》等早期文献记载中，关于傣族历史等方面的描述只有零星的片言数语，而且往往语焉不详；晋朝，常璩著《华阳国志》中有明确记载傣族历史情况的文字；唐朝，樊绰的《云南志》（即《蛮书》）是一部最早、也是较多地记录傣族情况的史书，它大致记录下傣族的地理分布、风俗及社会政治状况，但是仍感不足。此外，在唐朝杜佑的《通典·边防·林邑》和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岭南道·欢州》，以及宋朝王钦若等编著的《册府元龟·外国部·国邑类》等文献中也有过此类一鳞半爪的记载。从元朝起，记载傣族历史的资料逐渐多了起来。元朝时期，有官修的《元一统志》等著作；私人撰著有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著《马可·波罗游记》、无名氏《混一方輿胜览》、李京著《云南志略》，以及其他的碑文、行记、塔铭等。明朝时期，记载有关傣族的历史资料比元朝多，主要见于《明实录》、《元史》等大量的官修文献。明清以后，记载傣族历史情况的个人著述颇多，如钱古训的《百夷传》、张洪的《南夷书》、朱孟震的《西南夷风土记》、毛奇龄的《云南蛮司志》、谈迁的《国榷》、无名氏《土官底簿》、无名氏《云南机务

抄黄》、田汝成的《行边记闻》、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等。明朝傣族典章制度的有关情况在《明会典》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明代有关云南（包括傣族）的方志纂修取得了空前的成绩，其中郑颺、陈文纂修的《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正德云南通志》，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刘文征著《天启滇志》等，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清朝时期，记载傣族历史的资料更为详细，主要有《明史》等官修史书，以及顾炎武的《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等，皆为今天研究傣族历史与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另外，清代也有云南志书，但是其史料价值不如明代的志书突出。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政府与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傣族历史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取得了较大成绩。政府对傣族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成果颇丰，代表性著作包括：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的《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1—10）、《德宏傣族社会历史调查》（1—3）、《临沧地区傣族社会历史调查》、《思茅、玉溪、红河傣族社会历史调查》等；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刊印的《车里宣慰世系简史》（1987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政协民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1987—1992年编辑出版了7辑《版纳文史资料选辑》；景洪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景洪文史资料选辑》；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史志办公室1984—1994年编辑出版了16集《德宏史志资料》；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德宏文史资料选辑》等。学者们对傣族史料的整理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主要有李拂一著《车里宣慰世系考订》（1947年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1983年台湾重订本）和译著《渤史》（旧平装本）、张公瑾《续渤史》（载《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9）和与黄建明等合编《民族古文献概览》（民族出版社，1997年）、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卷3、卷4、卷5，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年)、刀永明著《车里宣慰世系集解》(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龚荫著《明清云南土司通纂》(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年)和《明史云南土司传笺注》(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及《中国土司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刀永明辑《中国傣族史料辑要》、张建章主编《德宏宗教》(德宏民族出版社,1992年)、华林著《傣族历史档案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年)等。这些研究成果,为学术界进一步开展傣族历史研究工作提供了宝贵资料,做了很好的铺垫。

关于傣族自己记载的史料,元代之前非常少,元代以后的文献资料还有待发掘。国外对其记载的史料也不多见。

现已被发掘出的傣文史料,例如《勐史》(李拂一译)、《车里宣慰世系》(高力士译)、《思氏谱牒》(方国瑜译)等,已经被译成汉文。傣族有较为丰富的民间历史传说,其中记录了许多有关傣族历史发展状况的传说故事。例如,广泛流传的《召树屯》,近年来已被学术界所重视。另外,一些傣族民间故事集也相继问世,如岩温编、征鹏编译的《傣族民间传说》、岩温等编的《十二魔头王:傣族叙事长诗》等,都可以作为傣族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现今学者在有限的傣族历史资料中,关于傣族历史各方面诸如傣族的起源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其他民族如哈尼族、汉族的关系等的研究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学者们关于傣族历史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 新中国成立前,是第一个时期。清末民国时期,中国边疆危机加深,许多学者纷纷投入到对边疆史地的研究中,对傣族的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影响较大的著作有李拂一著《车里宣慰世系考订》(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1944年)和译著《勐史》(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1947年)、姚荷生著《水摆夷风土记》(上海大东书局,1948年)、陈翰笙著《解放前

西双版纳土地制度》(原名《中国西南边疆土地制度》,于1948年著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8月重新出版)、江应梁著《西南边疆民族论丛》(广州珠海大学,1938年)。

2.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1978年,是第二个时期。在中国内地有江应梁著《摆夷的生活文化》(上海中华书局,1950年)、《摆夷的经济生活》(广州岭南大学,1950年)、《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官与土司》(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等代表作,他们历史唯物主义地探讨了土司制度产生的经济基础,对元、明傣族土司制度也有较为科学的论述。

在台湾,以包遵彭先生主编的“明史论丛”第五——《明代土司制度》(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一书为代表,其中收录了余贻泽先生的《明代之土司制度》(载《禹贡》第4卷第11期)、凌纯声先生的《明代在中南半岛所置十宣慰司》(载《大陆杂志》第1卷第1期)及黄开华先生的《明代土司制度设施与西南开发》(载《新亚生活》第8卷第7期,1965年10月)。余贻泽先生的《明代之土司制度》一文,对“土司制度之起源、土司之等级与俸禄、土司之承袭、征调,明朝之剿抚策略,及改土归流等设施,都有概略的讨论”;“近年我国学人,对斯学有贡献者”当首推《明代在中南半岛所置十宣慰司》一文,该文“参酌中外载籍,条分缕析,折中至当”;《明代土司制度设施与西南开发》一文“引证博洽”,是一篇运用历史文献结合近人实地的考察报告,“聚官私之记载,核新旧之见闻”^①。书中包遵彭先生作导论,对三位先生的论著评述十分恰当。

在日本,以神田信夫的论文《明初滇边土司的设置》(载《东洋学报》,1953年35—3、4)为代表。

^① [台湾]包遵彭:《明代土司制度·导论》,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第2页。

3. 改革开放以后,傣族历史文化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是第三个时期。此时我们国家的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学术文化也很快走上繁荣之路。傣族的来源、社会制度、历史文化、经济等方面的著述如雨后春笋,学者们在各方面对傣族史进行深入研究,成果较多。论述傣族族源的论文主要有曹成章的《傣族的古代开始于何时》(《思想战线》,1983年第3期)、江应梁的《傣族史涉及东汉掸国的商榷》(《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等;研究傣族社会制度和性质等方面内容的著作有曹成章著《傣族社会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论文有曹成章的《傣族农奴制和宗教婚姻》(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关于傣族麓川社会的性质问题》(《思想战线》,1985年第4期)、《傣族社会的家族公社及其残存的原因》(《民族研究》,1984年第4期)、《西双版纳傣族封建社会的法制》(《思想战线》,1981年第2期)、《泰国的萨迪纳制和中国云南傣族地区的田官制度》(《东南亚》,1990年第3期)等,江应梁的《傣族史中有关奴隶社会的探讨》(《思想战线》,1982年第3期)、胡绍华的《西双版纳傣族的封建社会究竟开始于何时》(《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马曜的《西双版纳和西周社会政治及礼俗制度比较——运用民族学资料研究先秦史一例》(《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4期)和《傣族的水稻栽培和水利灌溉在家族公社向农村公社过渡和国家起源中的作用》(《贵州民族研究》,1989年第3期)、何平的《傣族古代社会形态演进与奴隶制问题》(《广西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等;研究傣族文化方面的著作有王松著《傣族诗歌发展初探》(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年)、张公瑾著《傣族文化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高力士著《西双版纳傣族的历史与文化》(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10月)、刀承华著《傣族文学研究:德宏傣族人的艺术智慧之光》(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等,论文有《傣族历法与

议》(《民族文化》,1980年第2期)、马曜的《傣族文化的历史轨迹》(《贵州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李京〈云南志略〉概说》;研究傣族土司制度的著作有龚荫的《明史云南土司传笺注》(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和《中国土司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吴永章的《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等,论文有江应梁的《近代傣族土司及其政治制度》(《民族学报》,1983年第3期)、胡绍华的《傣族土司制度的特点及其对傣族社会历史的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研究明代麓川政权以及明朝与麓川政权矛盾的代表作有尤中的《明朝“三征麓川”叙论》(《思想战线》,1985年第4期)、万揆一的《明代麓川之役和〈陈言征麓川略〉》、魏罗罗的《麓川之役初探》等。傣族史的编著较多,有江应梁的《傣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傣族简史》编写组编《傣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朱德普的《历史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研究傣族历史地理的著作有方国瑜著《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论文有宋蜀华的《唐宋时期傣族历史上的若干人名地名研究》(《民族研究》,1981年第1期);研究傣族土官谱牒的有方国瑜《麓川思氏谱牒笺证》(《民族学报》,1981年第1期)等;研究傣族宗教的著作有朱德普著《傣族神灵崇拜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王松和王思宁著《傣族佛教与傣族文化》(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张公瑾著《傣族宗教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等;研究傣族稻作农业历史的成果有曾雄生的《傣族古歌谣中的稻作年代考》(《自然科学史研究》,1998年第4期)等;研究傣族对外关系的代表作有《古代中国与缅甸的友好关系》(《东南亚》,1985年第4期)等。

4. 进入21世纪,在学者们的高度学术钻研热情下,新论文、新著作不断涌现,进一步丰富了傣族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内

容。其中探讨傣族起源的论文有：何平的《傣泰民族起源再探》（载《民族研究》，2006年第5期）、罗美珍的《傣泰民族起源和迁徙问题补证》（载《民族研究》，2006年第5期）；研究傣族政治史的代表作有：娄自昌的《叭真的攻略扩张及其在小泰区域——泰民族强盛过程中的历史地位》（载《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1期）；关于傣族文化研究的代表作有：杨庆的《西双版纳傣族传统聚落的文化形态》（载《云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和《西双版纳傣族传统聚落规划思想的文化渊源》（载《思想战线》，2000年第4期）、王懿之的《云南新平傣族的历史与文化》（载《云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华思文的《傣泰民族的“勐”文化》（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胡绍华的《评〈傣族村社文化研究〉》（载《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关于中央王朝与傣族关系的论文有：段瑞、和六花的《元代对云南行省傣族地区的统治》（载《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1期）、赵明生《临沧傣族土司的兴起、发展与衰亡》（载《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1期）、赵毅《论明清时期南甸土司的汉化》（载《德宏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3期第17卷）。此外，还有几篇有代表性的博士学位论文，其研究范围比较广泛，包括了政治制度、经济、文化以及傣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等内容。即贾仲益《“三征麓川”与明代边政》（2000年）、刘建勋《壮傣稻作文化起源和发展的语言学考察》（2000年）、邓永进《传承与变迁》（2000年）、华思文（泰国）《泰傣民族发展史中的勐文化》（2000年）、陈名杰《明代西南土司制度研究》（2002年）、于秀情《明朝经营百夷研究》（2003年）、刀伟《傣族法律制度研究》（2005年）、程印学《清朝经营傣族研究》（2005年）、李晓华《桂西壮族与西双版纳傣族封建领主制比较研究》（2007年）等。

有关傣族历史与文化的研究著作也不少，有曹成章著《傣族》（民族出版社，2004年）和《傣族村社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王国祥著《傣族历史文化求是录》（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白云主编《云南元江傣族研究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马旷源著《傣族文化集》（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临沧傣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2009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曹成章先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傣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著有《傣族村社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一书。这是曹先生多年来研究傣族历史文化的结晶，对整个傣族历史文化研究工作作出了较大贡献。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胡绍华先生评价说，曹先生提出的“傣族村社文化”概念，是曹先生多年钻研与长期实地调查的结果。他以傣族封建领主制社会是建立在农村公社基础上的理论作为出发点，进而研究农村公社对傣族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书中紧扣傣族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农村公社这一历史现象，逐一解析傣族各种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内涵和特点，揭示了傣族文化与村社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证明傣族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是建立在农村公社基础之上的，因此傣族文化被定义为“村社文化”。胡绍华先生对该书予以高度评价：“《傣族村社文化研究》的出版，为研究村社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①它为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拓宽了路径，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将步入新的境界。另外，曹成章先生还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政府委托撰写《刀安仁传》。刀安仁先

^① 胡绍华：《评〈傣族村社文化研究〉》，载《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第103页。

生跟随孙中山先生，参加了辛亥革命，在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刀安仁传》记述了著名的傣族资产阶级革命先驱刀安仁先生的生平事迹。《刀安仁传》的出版无疑是对傣族人民参加中国人民百年革命斗争精神的褒扬，是对傣族优秀的历史文化的弘扬。

国外有关傣族的历史研究成果也较多。由于资料所限，本书仅对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关于傣族历史研究所取得的一些成果作一概述。日本的学术界一般认为，曾经建立了南诏和大理政权的云南，只是在忽必烈征服大理以及大理国灭亡后的新的历史开端中，才第一次有了新的特色。这一历史事件是云南汉化过程的开始，使这一地区在后来的东南亚大陆民族（部落）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居于重要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学术界对大理之后，尤其与傣族历史发展相关联的早期封建王国的勃兴充满兴趣的原因。这一系列的特定课题包括：与居住在靠近缅甸北部边境的掸人的移动相联系的元朝对缅甸的征服情况，古代傣族封建王国如车里、“八百媳妇”的形成，元朝的遏制政策等。

通过研究元明时期云南被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统治范围过程，即关于云南行省制度的研究，松田孝一试图了解有关蒙古人对这一地区进行统治的问题；栗林宣夫通过探讨诸如土司制度中土司、地方酋长及流官的地位，来论述土司制度是如何实施的；神田信夫则根据明代的资料来探讨靠近缅甸边境地区的土司的设置程序问题；喜田干生探讨了明代对麓川蛮（一个居住在云南西南部的很大的部落）的遏制政策，并说明中央王朝是如何通过促使部落共同体的内部瓦解来建立他们在该地区的统治势力的。此外，还有太田常藏对明代统治下的云南及缅甸的土司如何逐步投靠新兴的缅甸东吁王朝的研究。

大理政权灭亡后，当地各地方政治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在这一研究领域，关于各地各族民众间的土司政治一体化和社会组织